

思想的踪迹

当代中国文化研究访谈录

Sixiang De Zongji

Dangdai Zhongguo Wenhua Yanjiu Fangtanlu

邹 赞◎编著

新疆大学211工程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编号：10YJCZH255）阶段性成果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新疆大学“211 工程”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编号:10YJCZH255)阶段性成果

思想的踪迹：当代中国 文化研究访谈录

The Trace of Thoughts: Interview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邹 赞 编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思想的踪迹：当代中国文化研究访谈录 / 邹赞编著

—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316-7827-4

I. ①思… II. ①邹… III. ①文化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95792号

思想的踪迹：当代中国文化研究访谈录

Sixiang De Zongji; Dangdai Zhongguo Wenhua Yanjiu Fangtanlu

邹 赞 编著

责任编辑 郭 翀 徐永进

封面设计 刘乙睿

责任校对 程 佳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

印 刷 黑龙江远东联达教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70千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6-7827-4 定 价 38.00元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网址：www.hljep.com.cn

网络出版支持单位：东北网络台 (www.dbw.cn)

如需订购图书，请与我社发行中心联系。联系电话：0451-82529593 82534665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451-82529347

如发现盗版图书，请向我社举报。举报电话：0451-82533087

序

当威廉斯在 50 年代开始构想一种新的“文化”定义,霍加特在 60 年代于伯明翰大学创建第一所以“文化研究”命名的学术机构时,都还只是出于应对英国国内一些社会与历史问题的考虑,并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一理念会在后来急速地发酵、膨胀,并通过不同方式的转义,渗入诸多的学科领域,以“块茎”式蔓延的态势扩展至世界各地的大学,促成了 20 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力的一种国际知识浪潮。

然而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变演效果,仍然是有必然律存在于其中的。这可以从多个方面加以推测与论证,学者们也已对之做过一些阐述。而如果从知识构形的方式上看,我认为,这一思潮与其初始阶段能够将英国本土的两种传统,即文化批评与经验科学的传统进行创造性的嫁接、熔铸,从而塑形为一种新的“知识批评”模式有密切的关系。很显然,相较于欧陆主导型的理性主义知识学传统,同样是在处理“知识”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时,这种从盎格鲁式(或 Anglo-American 式)思维中演化而来的知识批评模式有其自身的特点。欧陆现代理性主义根源于古典哲学、形而上理论,因而偏向于将预设的“真理目的论”与“理性因果链”作为解释世界的路径,通过自下往上的不断抽象,以形成一组具有内在体系化与规定性的认识秩序。尽管欧陆也有经验科学(如财富经济学、历史学、博物学等),但是正如福柯在《词与物》中所揭橥的,由于其受制于理性主义哲学的引导,同样热衷于将经验与知识纳入到一套组织化与可控性的思想框架之中。自 20 世纪中叶始,这一模式接受了来自于欧陆内部的挑战,遭到如德里达、福柯与德勒兹等的解码,并以为可将对知识的考察置回于一种“情境”或“话语”之中,这也可看作欧陆学者与英美学者在这一时期达成的某种共同意识。但正如斯图亚特·霍尔后来所指出的,无论是欧陆的结构主义还是后结构主义,都主要还是采用一种“向上还原”的方式,并未舍弃哲学普遍主义与

预设论的框架,可将之看作是一种新哲学与旧哲学之间的对话。而经验主义则易偏向或导致对世界的具感性、流动性的开放性体验,由此而建立起另一种大为不同的知识构形。因此,在主导欧陆的现代思想体系中,“世界”仍是一个从思辨者的角度阅读到的文本,或是从个体书写者的角度从上往下观察到的“景观”,而在从经验主义传统中发展出来的英国文化研究那里,世界则被看作是处在移步换形过程中的不同时段、时刻、场域等,也是自己曾经历验其中的真实“社会”或“日常生活世界”,是他们自己所出身的劳工阶级社群、种族社群与性别社会,或他们能够践行其中的亚文化群体、电视观看者、消费大众等等,世界不仅是一种思想、书写或档案的文本,更是一种由复杂的社会关系构成的,同时也是被特殊化语境框定的社会文本,尽管两种文本之间存在着相互建构的关系,但后者无疑更被他们看作是自己学术起步的地方。通过对不同知识构形传统的考察,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文化研究首先会出现并盛行于英国、美国等地而不是欧陆学术界,当然这还仅仅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批评”的概念,笼统而言,包括文化批评、社会批评与文学批评等,这些分支概念有时也可相互指称,它虽然会与某些文类范畴建立较为确定的联系,但更与一种相对独立且自由的意义判断相关。在英国文化研究前史中,那些社会的公喉如阿诺德、罗斯金、劳伦斯、托尼、利维斯等均是以批评家而不是学者的角色活跃于公共视野之中的,然而在学院的评判体制内,批评则一直处在一种比较边缘的位置上,甚至利维斯在爆红之后,也长期未能获得大学的认同。有许多研究者在后来都提到,50年代出现的文化研究其实是由早先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发展而来的,这个判断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文化研究又无法在文类或形态的意义上归属于批评,而是直接称自己的工作模式为“研究”,显然更多地兼备了我们目前所认定的“学术”的质素。对于这种模式上的转换,我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根据英国学院制发展的历史做了一些探索,随着20世纪以来尤其是战后英国高等教育的扩张及科范主义的借势上位,大学不仅成为收编外部公共思想的一个主要场所,也同时成了新的思想与知识创新的聚散之地。也正是在这种趋势之下,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等主动离开长期从事的成人教育社会活动,而成为大学正式的签约成员,并将第一个文化研究的机构即CCCS设置在大学的体制之内,这也意味着他们会将经验科学式的学术研究(如民族志学、历史编纂学、社会学等),包括对各种专业化理论工具的研究,视为自

己工作的主要内容,以使从早期秉承的文化批评能与日益发展的经验科学耦合在一起,锻造出一种新的知识批评模式。就此而言,文化研究也大致可称为是一种批评性的学术,或学术化的批评。这种知识构成形态,既不同于旧的、带有较强随感性的批评范型,又有异于体制内的一般性的学科研究,从后一方面来看,文化研究与专家主义的区别,在于其并不将知识放在绝对主义之“真”的坐标上来运演和确定,也未曾将自己视作绝对“真理”的追求者,而是始终在学术的研究中贯穿了某种批评,甚至自我反思的理念,将“批评”的本义,即一种知识伦理判断视为学说展开的原动力,包容在研究的核心之处,以便借此而在多个不同的层次上参与到更为广阔的观念史对话、协商与竞争之中。

当然,从目前已形成的文化研究的大体面貌来看,英国文化研究并不是唯一的工作样板。从其发展过程来看,或如威廉斯在稍晚曾描述的,可以将文化研究看作是“形制”(formation)与“规划”(project)相伴随的一个作业过程。形制的概念表明了文化研究中会有一些确定的意义(不然就超出了定义的边界),规划则是指每一个阶段都会因工作方案的不同而产生出多样的言说变体,并以多元差异的链接方式扩展与变迁其主题、思想与方法等,从而使文化研究处于不断重构的状态之中。这个规划的扩展也应当包括知识地貌学意义上的,为此又在不同的地景中产生出了复数化的文化研究。当然,文化研究之所以能够在80年代后波及世界各地,也取决于各国、各地区的社会问题结构在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展开次序中形成的某种趋同,比如文化研究议题中直接针对的工业主义、商业主义、公众社会、大众传播,或后期出现的全球资本与财富流通、民族文化与多元政治冲突、电子媒介景观、后女性主义浪潮等等,同样也是东亚或中国等所遭遇的现实,并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各种知性活动带来了不可抹去的影响。而对以上这些现象的分析,旧的知识形态与评判模式(也包括预设性的理性主义与古典实证主义)显然已经是力不从心了,因此也使得文化研究在各大区域的出场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态。在这种情况下,有时我们甚至不需要借助于“经典式”的阅读与效仿,就有可能直觉地切入到文化研究的叙述条理中,就如同我们不一定要刻意地去习研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理,就有可能在思考事物时与之达成某种观念上的契合。与之同时,既然文化研究本身即被看作是一种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言说,而不同区域的语境中又均会深嵌着各自特有的、无法重复的历史、政治与文化等根源,并在当代的社会结构关系组

合中呈现出鲜明的差异,那么几乎所有“做文化研究”的学者都仍然会以自己本土的问题意识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进而展示出在地经验在钳入文化研究这个统名时的特殊性。将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看,如果我们说尚存在着一个“国际文化研究”的概念,那么在这个假定的语象中也必然性地会包含有甚为多样的意义面相,包括了研究者们对共同的世界问题与不同的本土问题的交切性关怀。

文化研究在中国的“落地”,学者一般将之溯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如此推算下来,也有20多年的光景了,也就是说,我们也已经有了一段不算太短的“文化研究时刻”,也有了自己的一个不算太长的学术“谱牒”。本书的编著者邹赞君长期以来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并期望通过学术访谈的形式,展现出中国学者在文化研究路径上走过的心路历程,这当然是一个很有创见、也很有价值的尝试。事竣之后,我大致浏览了邹赞君提供的目录与辑入的稿件,见到受访的学人多为这一领域的“开疆辟土”者,或可能对这一领域发声的学界宿尊,并都是我所钦佩与敬重的学者。在对这些访谈录的拜读中,我也有几点感想,试不揣简陋呈表如下。首先,从这个集子中,我们可以见到文化研究在这20多年来对中国学界与知识人产生的真实冲击,并影响到了各个学科与分支学科,尽管选取访谈的面似有嫌不够(想必受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但仍大体上不仅反映出了中国学者对域外思想的消化与反馈的方式,而且如实地记录了文化研究在本土化实践过程中的成长特点。其次,不同的受访者对文化研究的理解事实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甚至分歧,这显然与各自的学科、思想等背景均有密切的关系,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化研究是一个可以从多重视角解释与反思的对象,而文化研究后期在国际国内的泛化趋势,自然也会给我们对之的识别带来一些困难。再者,我也甚为惊叹于访谈主持人为此工作所做的巨大努力,其在提问中表现出的广泛的知识储备,十分警悟的问题意识,均非一般泛泛之士能够做到,相信这种褒奖也是能够被读者所体察的,而非出于某种廉价或应景式的谀美之心。

黄卓越

2014年1月于北京西北郊

前 言

一

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术思潮,经过理论的旅行,顺应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大众文化蓬勃兴起的历史契机,迅速登陆并占领当代中国文化舞台。文化研究被公认为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学术主潮,其开放性、实践性、当代性、边缘性的学术品性使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格外受宠的研究课题。来自于文学、传媒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学者们纷纷参与到文化研究中来。尽管有学者坚持用“文化诗学”“文化批评”等来对抗“文化研究”,或者将跨学科的文化研究直接等同于“文化批评”,但这些都无法掩盖一个基本的事实:文化研究的确已经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中国大陆兴起并以如火如荼的态势蔓延。

1985年,杰姆逊的北大之行以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的出版可以视为文化研究传入中国大陆的先声;1994年,《读书》杂志先是刊登了李欧梵和汪晖关于“文化研究”的学术对谈,话题涉及“霸权理论”“多元文化主义”“区域研究”等,随后又举办了“文化研究与文化空间讨论会”,这也被视为中国大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讨论会”;^①2005年,托尼·本内特、约翰·斯道雷应邀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文化研究”专题演讲,两位伯明翰传统的重要理论家的传经布道标志着英国文化研究在中国大陆正式泊港。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全新的研究路径被中国大陆学界迅速传播和接受,并且在以文艺学为中心的

^① 白露:《生活在“不可理解之中”——对〈读书〉九月份“文化研究与文化空间”讨论会的记录与感想》,载《读书》,1994年第12期。

学科阵地中攻城略地。其发展轨迹呈现出下述特征：其一是召开了诸多以文化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诸如1995年8月召开的“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研讨会；1996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文化接受与变形”国际研讨会；2000年，首都师大主办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研讨会；2008年9月，首都师大比较文学系主办的“英语文学与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2012年，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影视文化国际会议，等等。其二是围绕文化研究的诸多学术论争，主要表现为文艺学领域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合理关系的论争。其三是出现了大量的文化研究译介读物和相关学术刊物，最为著名的有三联书店推出的由陆扬、王毅编著的《大众文化与传媒》、《大众文化研究》，王逢振主编的“先锋译丛”“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以及《詹姆斯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的由李陀主编的“大众文化研究译丛”，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李陀主编的“大众文化批评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由张一兵主编的“当代学术棱镜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由常昌富主编的“传播与文化译丛”，由王逢振、希利斯·米勒主编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以及商务印书馆推出的由周宪、许钧主编的“文化和传播丛书”。陶东风主编的《文化研究》辑刊成为介绍西方文化研究前沿理论以及以专题形式从事本土文化现象个案分析的前沿阵地；戴锦华主持的“光影系列”连续推出了《光影之隙》、《光影之忆》、《光影之痕》，成为以电影文本为切入点，图绘后冷战全球文化地形的范本；王晓明主编的“热风书系”聚焦于本土经验与个案分析，广有影响。各种冠以“视觉文化”“媒介文化”“文化研究关键词”“亚文化”“粉丝文化”等出版物大量涌现，文化研究成为一项颇为壮观的“学术出版事业”。

值得一提的是，以政治性、实践性、边缘性和批判性为学术特质的文化研究，其源初意义上的“反学科/后学科”在中国大陆的现实接受语境中被消解，成为学院机器争相占领和收编的宠儿。1995年，北京大学成立了由戴锦华教授主持的“文化研究工作坊”，2008年，在工作坊的基础上组建了“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1998年，上海师范大学成立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其研究课题涵盖都市文化史、国际都市文化比较、消费文化与创意产业等；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文化研究网站”，2006年因故停办；2004年，上海大学成立文化研究系，王晓明教授出任系主任，该系侧重学术研究，专门为研究生提供文化研究跨系课程，设立当代文化研究网，旨在培养以思想史和文化史为基础、以批判视角研究中国

当代社会问题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新疆大学等均设有文化研究硕士、博士招生方向,首都师大更是率先自设“文化研究”博士招生专业。

正当诸如此类的文化研究机构从事着“研究文化研究”(research for Cultural Studies)或“做文化研究”(do Cultural Studies)时,批评界出现了另一种悲观论调:文化研究热正在退潮,文化研究必然走向衰落,其基本的依据大多是“文化研究”的发源地——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已于2002年撤并重组。在笔者看来,这种悲观的论调在某种程度上是荒谬的,因为作为独立学术机构的CCCС被撤销并不意味着伯明翰传统的学者们改弦更张。事实上,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桑德兰大学等都拥有文化研究机构,CCCС的灵魂人物斯图亚特·霍尔于1979年去了开放大学,继续从事多元文化主义和视觉文化研究,其他一些学者如安吉拉·迈克罗比、托尼·本内特、大卫·莫利等也继续活跃在文化研究领域。再者,文化研究也从来没有许诺过其理论具有普适性,霍尔的“不做保证”和对差异政治的强调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应和着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兴起的语境以及知识分子渴望参与社会实践和社会批判的理论诉求,它应该具备自身的参照系、理论话语和发展轨迹。然而,单纯横向移植西方文化研究理论资源,缺乏与本土现实情境的有效对接却又是中国大陆文化研究不争的事实。比如参与文化研究的理论家大多是文艺学或中国当代文学领域的专家,其文化研究往往流于对西方文化理论的移用与仿照,表现出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研究方法大多沿袭文学批评的“文本细读”,缺乏必备的技术性方法训练(如受众研究要求的民族志和社会学统计方法);研究的对象集中在影视文化、都市文化和时尚潮流,疏于对边缘文化的关注;研究大多流于话语层面的操作,缺乏对后冷战政治经济情势的宏大视野,并没有真正深入到文化与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日益呈现出被文化产业收编的态势,等等。那么,当前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如何才能走出身陷的困境?我们可以从英国伯明翰学派吸取什么样的理论遗产和实践经验?文化研究如何处理与学院机制化之间的张力关系?除了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文化研究理论是否可以成为研究中国西部地区特殊文化群体和文化现实的有效话语资源?

二

CCCS 第二任主任、被誉为“当代文化研究之父”的斯图亚特·霍尔始终坚持文化的地域性和历史性,反对将文化研究廉价转移到其他文化环境中,强调文化引入的地域政治空间。霍尔本人就曾劝告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学者:“你们要研究自己的问题,从中国现实中提取问题。”^①当前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必须根除机械套用外国理论来包装和分析中国经验的弊端,陶东风以包亚明等对上海酒吧的文化研究为例,指出这种所谓文化个案分析机械搬用了西方的现代化、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文化理论。包亚明等在文章的末尾写道:“无论是作为乌托邦的消费空间,还是作为公共领域的催生地,酒吧或咖啡馆都代表着民主、平等和交往行为的胜利。”陶东风承认自己并不否认酒吧在一定程度上有进步的政治意义,但是强调必须看到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的酒吧是在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与社会制度中产生的,所以,“这种把消费主义理想化的倾向与脱离中国语境搬用西方理论不无关系”^②。霍尔对文化研究中特殊语境的强调、对文化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重视启发我们: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没有可供照搬的现成理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国本土林林总总的文化现象,坚持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与思想史的再读与反思,借助西方某些成熟的文化研究理论,尝试对本土的文化现象做出理性而有益的应答。诚如墨美姬(Meaghan Morris)所言:“我期待在中国大陆开展的文化研究能够更为关注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的向度。这个世界很需要出现‘另一’文化研究的方式,而不仅仅是通俗文化研究。在西方已经有很多简单的‘通俗文化’研究(“popular culture” studies),那可能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很有吸引力。年轻人通常喜欢做媒体、大众文化研究、消费等方面的题目。但是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世界其他地方也发生着类似的事情。我想,像王晓明、戴锦华、汪晖教授他们开展的工作聚焦于中国的文化历史和政治经济状况,把凝聚中国经验的知识发掘和传播

① 金惠敏:《听霍尔说英国文化研究——斯图亚特·霍尔访谈记》,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 年第 6 期。

② 陶东风、徐艳蕊:《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93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开来。这是很有价值的。”^①

作为文化研究的后发地,我们无法避开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做一番仔细的理论清理和分梳,在急于“做文化研究”之前“研究文化研究”,重返伯明翰的理论回溯和反思于是显得尤为重要。伯明翰学派花开花落,昔日文化研究的发源地突遭变故,这一文化事件使得弗兰克·韦伯斯特和道格拉斯·凯尔纳等学者开始反思以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理论。弗兰克·韦伯斯特认为:霍尔冒着反还原主义变成没有任何评价成分的对差异性一味赞赏的风险,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方法占据统治地位的地方,对物质因素以及结构性不平等的考虑有所忽略;针对霍尔文化理论的庞杂和艰涩,弗兰克·韦伯斯特毫不客气地斥之为“一种理论主义(theoreticism)的自我迷恋”^②。道格拉斯·凯尔纳则强调,霍尔在“文化的循环”中突出生产、再现和接受,由于强调文化是表征与意指实践,霍尔更加关注的是从符号和话语层面研究文化,对生产的环节有所忽视。霍尔的文化理论始于生产,但由于过分借重于阿尔都塞、葛兰西,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差异理论,而在具体的文化研究中并没有始终坚持政治经济学方法。当前一些文化研究理论家(如格罗斯伯格)由此看到了霍尔模式的不足,宣布文化研究要克服自身的范式危机,就必须重新回归政治经济学方法。

笔者以为,以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在为文化研究做出开创性贡献的同时,其文化理论也存在几个较为明显的不足:其一,对经济决定论的反驳有矫枉过正之嫌,忽视生产而过分夸大消费的能动意义,从而导致文化研究容易陷入民粹主义(populism),这在后来以菲斯克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二,在文化研究实践中表现出将性别、性向、种族等所谓的身份政治置于阶级政治之上,由于过分专注于“微观政治”“差异政治”而呈现出陷入理论主义深渊的态势,因此近来一些冠以“文化研究”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成了炫弄话语的“演武场”,后字打头的理论术语比比皆是,但却未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其三,多元文化主义可能会冲击一个民族国家主文化的确立,比如,霍尔后期所倡导的多元文化主义观高度重视边缘经验和差异因素,但却忽视了民族国家主

^① 张春田、王颖:《“另一种”文化研究的可能:从亚际文化研究出发——墨美姬(Meaghan Morris)教授访谈》,载《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7年第3期。

^② 弗兰克·韦伯斯特:《社会学、文化研究和学科边界》,参见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1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以伯明翰学派文化理论的不足之处为“镜”，可以折射出当前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发展前景。由于社会形态、历史背景、民族文化等的特殊性，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必须避免将福柯、德里达、葛兰西、萨义德、杰姆逊、鲍德里亚、斯图亚特·霍尔等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家的理论膜拜为“元理论”，而应该在文化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日常生活、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研究等众多的理论迷宫中突围，始终坚持政治经济学模式和批判立场，超越狭隘的学院视角，真正做到“与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对话和论争”（格罗斯伯格语）。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看，当今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格局可以说就是以北京、上海为中心的文化研究，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几乎处于“失语”状态，这与文化研究所倡导的边缘立场和解构中心的学术旨趣相去甚远。况且，广大的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其多元文化的现实情境、丰富而特殊的文化现状等都为文化研究理论的本土实践提供了理想的分析对象，对此笔者将在下文做一些非常个人化的思考。

三

Cultural Studies^①的编者寄语中，主编格罗斯伯格回忆了文化研究在过去的五十年历程中，在学院内外均取得了成绩，有些成绩甚至是出乎意料的。“文化研究的许多真知灼见、争论甚至是分析，都已经成为新的政治和政治经济斗争的策略，甚至是主导性的策略。”瑞恩·比肖普教授认为文化研究在学院体制内的成功使它受制于工具主义的体制驯化，“文化研究必须超越作为一个长存的学科，超越大学的利益，成为更具生产性的、高要求的和批判性的思想交锋的场所”^②。约翰·哈特利在清理当前西方学界对文化研究的批评时罗列了七点，其中之一为“太过于学术化，实践性不够；或者是太专注于实践，缺乏学术深

① 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是国际文化研究权威期刊，其前身是 Australi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该刊目前已出版23卷，社址设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

② 易晓明：《文学与文化的论争与叉合——“英语文学与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63页。

度”^①。当前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对文化研究自身的反思和批判，这也成为反映西方文化研究最新动态和发展前景的风向标。过于学院体制化，英语中心主义，逐渐沦为了一项“出版事业”，以及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相脱节等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主要病征。诸如此类的理论反思为我们思考当下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

当前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大致分为两个脉系：研究“文化研究”和做“文化研究”。前者侧重对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法国后结构主义等经典著作进行脉络清理和研读，力求梳理出文化研究的理论特质和应答中国现实问题的可能。后者则在理论输入上有所忽视，热衷于对文化现象尤其是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进行批判式解读。这样做的结果是前者流于理论文本的细读，从符号到符号，缺乏应有的批评实践；后者热衷于介入批判实践，但往往在理论上显得单薄，存在照搬甚至误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现象。同样是酒吧和咖啡馆文化研究，由于中国大陆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加之中国并非已然步入所谓的消费社会，因而我们的酒吧和咖啡馆文化研究必然迥异于西方，如果照搬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和交往行为理论，就会显得极不协调。文化研究的“理论旅行”与“现实观照”应该是相辅相成、有效接合的，它必须立足于本土文化现实、融汇西方文化研究理论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与文化史的理论资源。

此外，当前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与商业合流，成为文化产业的麾下兵勇。某种程度上说，许多冠以“文化研究”头衔的学者，其旨趣所在往往是文化产业。当然，文化研究的诸多理论如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菲斯克的“两种经济”、本内特的“文化政策”、哈特利的“创意产业”都为文化产业提供了新颖的理论视角，文化研究并不与文化产业天然对立。但是，文化研究以批判和意识形态分析为理论特质，加之当前处于后冷战和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大陆在文化上面临着以美国大众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霸权侵袭的现实，知识分子首要的使命应该是坚持批判立场，以抵制外来文化霸权和谋取内在边缘群体的文化空间为己任。诚然，文化研究不仅需要解构，也呼唤积极的建构，但这种建构应当始终以弱势群体的生存处境为现实观照，以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的社会使命为准则，自觉抵制那种行“文化研究”之名攫取暴利的投机行径。

^① John Hartley. *A Short History of Cultural Studies*, SAGE Publications, 2003, p. 2.

最后，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绝不应该只是北京或者上海的文化研究，在区域上应更多关注“文化地理学”意义上处于边缘，而“地缘政治学”意义上处于中心的广大西部地区。试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例，以往的兵团屯垦文化研究都是单纯从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出发，缺少跨学科的交叉深度研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既有自汉唐以来的西域屯垦文化的历史印记，也是当代中国为构建一个和谐的多民族国家而设立的特殊建制。内地移民与新疆各民族群众杂居的人口布局，多种形态的宗教文化，交织着草原文化、农耕文化和绿洲文化的文化生态等为文化研究理论的本土实践提供了绝佳案例。在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域下，可以从以下角度展开课题：多元文化与民族国家的主文化构建；屯垦文学创作与文化认同；屯垦题材影视剧的症候式解读；文化区隔、文化分层与屯垦文化变迁；消费主义与边地青少年亚文化；屯垦历史记忆的文化再现与认同建构，等等。事实上，西部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独具特色的文化现状为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或许，这也即将成为中国大陆众多文化研究者关注和重视的课题。

四

“文化研究”作为一个舶来品，它如何旅行到中国大陆，其间香港、台湾的文化研究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是什么，它是否有助于引导当下的文学批评走出困境？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与文化诗学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差异？当下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应该怎样对待伯明翰学派的理论遗产？在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语境下，批判是否可能，是否依然有效，是否足够？后理论时代，理论何为？当下中国的文化研究如何处理性别、族群、亚文化等核心议题？如何思考文化记忆与历史书写之间的张力关系？

这本学术访谈录以上述追问为基本的问题意识，尝试以专题访谈的形式，邀请两岸三地十几位顶尖学者就中国文化研究的若干重要面向展开深度对话，话题涉及“伯明翰学派与中国文化研究”，“媒介、美学与文化研究”，“跨文化研究范式及其方法论反思”，“民族志与日常生活理论”，“全球化、本土性与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比较文学的文化转向”，“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思想图

景”，“空间政治与都市文化”，“性别政治”，“文化研究的区域经验”等方面，受访专家包括乐黛云、童庆炳、戴锦华、汪晖、陶东风、黄卓越、陈清侨、金惠敏、陆扬等学界尊宿。

本访谈录历时五年，系国内首次以学术访谈的方式呈现“文化研究”这一显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之路，也是国内首次全面追踪这一跨学科研究范式的在地性实践，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首先，本书既有别于一般性的文化研究学术专著，也不同于常规的学术访谈。它试图展现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思想知识图景，既有宏观层面的历史化勾勒，也有微观细部的个人化展示；既汇集了文化研究的核心理论话语，也穿插了许多本土实践案例，较好地体现了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世界与本土的结合。

其次，本书针对每位学者之于中国文化研究的具体贡献发问，有意识地引入学界的焦点话题，让学者从各自持有的学术立场和学科领域出发，交流对话，以便达成思想交锋与交叉共振的效果。

最后，本书有意识打破学科疆界，充分体现出“文化研究”固有的开放性和跨越性，受访专家涉及文学批评、电影理论、社会学、民族问题研究、比较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等领域，行文也尽量保持学术对谈的在场性和思辨性。

邹赞

初稿于2009年4月

修订于2014年5月

目 录

序	(1)
前言	(1)
第一编 在地经验与本土实践	(1)
文化镜城与隐形书写——戴锦华访谈	(3)
绘制思想知识的新图景——汪晖访谈	(26)
“文化研究”的香港经验——陈清侨访谈	(41)
“文化研究”的西部经验——刘志友访谈	(52)
第二编 理论旅行与他者镜像	(61)
追述与反思:伯明翰学派与文化研究——黄卓越访谈	(63)
雅努斯神话:媒介、美学与文化研究——金惠敏访谈	(86)
现代性、日常生活与文化研究——陆扬访谈	(99)
全球化、本土性与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马戎访谈	(109)
第三编 焦点论争与方法问思	(127)
从“文化诗学”到“文化研究”——童庆炳访谈	(129)
“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本土实践——陶东风访谈	(141)
“写文化”与民族志“真实”——彭兆荣访谈	(151)
重返“80年代”的限度及其可能——张旭东访谈	(171)
第四编 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	(179)
“文化转向”与中国比较文学新视野——乐黛云访谈	(181)
跨文化研究范式与作为现代学术方法的“比较”——陈跃红访谈	(191)